
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郑师渠

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欧战后的世界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就中国而言,因国人对此感悟不同,欧战后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发生了新的变动。由是形成的张力和搏击,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契机。

一、“西方的没落”与世界文化的对话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使许多欧洲人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陷于悲观、混乱和迷茫之中。因之,彷徨无主,哀叹颓唐,复古迷信之风,弥漫于欧洲大陆。法国著名作家韦拉里 1919 年初在与人书中说,欧人危疑彷徨,莫知所措,杂药乱投,实陷于理性危机。“此种纷乱而复杂之情形,适足见欧洲人精神之悲苦。”^①不过,韦拉里等人还只是看到欧人的理性危机,而德国的一位青年中学教师斯宾格勒于 1918 年 7 月欧战刚刚结束,便推出他的成名作《西方的没落》,径直断言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没落的命运。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犹如有机体,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过程。欧战不是“民族感情、个

① 《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1928 年 3 月 5 日《大公报·文学副刊》。

人影响或经济倾向的一团一时性的偶然事故”；而是表明西方的“浮士德文化”正走向死亡。《西方的没落》初成于1914年欧战前夕，似乎不幸而言中，故出版后立即轰动了西方。初版9万部，风行一时，其盛况为达尔文《物种起源论》出版以来所未有。

欧战既使许多西人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他们痛定思痛，对遥远静秘而又陌生的东方文化便油然而生羡慕之情。故战后的欧洲出现了“崇拜亚洲之狂热”，中国文化也在欧洲大行其道，孔子、老子被许多人奉为宗师，其中仅《道德经》的译本战后的德国就出版了8种。此外，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各种团体，也在各地建立起来。一位西方学者说：“东方文化在欧洲之势力及影响早已超出少数消遣文人及专门古董家之范围，而及于大多数之人，凡今世精神激扰不宁之人皆在其列。”^①

欧战也令久视西方为自由、平等、博爱故乡的东方民族目瞪口呆，引起了后者对东西文化的反省。印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被时人誉为“东方第一大人物”，他的见解颇具代表性。战后泰戈尔在欧洲各地的演讲，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压迫，他说：欧洲民族“妄自尊大，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最高之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灭，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成之罪恶。希望青年将从前种种罪行忘去，努力为新世界之造。”^②其后，泰戈尔访问了中国与日本，继续发挥他的观点，鼓吹复兴东方文化。他强调指出，我们相信西方文化有自己的优长，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大可造福人类，因之西洋人民“有教导世界的使命”；但我们更相信促进人类和平的伟大事业，必须具有伟大的胸怀，因为科学固然重要，“但是创造的天才却在‘人’的精神理想中”。西方对东方的侵

① 《孔子老子学说对德国青年之影响》，《学衡》第54期。

② 《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第2期。

略,尤其是此次可怖的欧战,足证西方人恰恰缺少此种“精神理想”与伟人的胸怀,若不能改弦更张,“西方人就不免要毁灭这个世界了”。^①其间,中国的许多报刊大量登载泰戈尔的文章、讲演与谈话,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日本舆论对欧战的反应也值得重视。1919年日本《新公论》杂志发表《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一文认为,欧战已令西方文明的“大缺陷”暴露无遗。欧人从来对自己的西方文明“尊重自夸,未免过甚”;实则文明并非欧洲的专利,例如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就是源于中国。东方人于西方文化一般都能热心研究、学习,从中获得教益,但欧人则反之,对灿烂的东方文化却不屑一顾。作者断言,西方文化要想得到根本救治,它也必须向东方文明请教,“而得暗示与启发”。^②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人们对欧战的反应愈显强烈。战后访问过中国的罗素曾提到,访华期间有不少人对他说,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③这是可信的。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这一点的,当数《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在欧战初期即连续发表了《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诸文,以为欧战将激起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西方文化在战争中已尽露弊端,这绝非是吾人的偏见;因之,国人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而不能全盘照搬西方。^④继杜亚泉之后,中国老资格的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批评西方文化更具分量的意见。1918年底欧战刚结束,梁启超即与蒋百里、张君勱等七人赴欧,到1920年3月归上海,历时一年多,先后考察了英、法、比、荷、瑞、意、德诸国。旅欧途中,梁随录自己的观感,这便是后来的《欧游心影录》。自1920年3月起,他将随感录的主要内容在上海《时事

① 泰戈尔:《东与西》,《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

② 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

③ 罗素:《中国之问题》,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190页。

④ 《东方杂志》第11卷第3、11号。

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分别连载,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梁不仅以他特有的“常带感情”的笔触,为国人生动地描绘了战后欧洲哀鸿遍野凄楚悲凉的情景,而且指出西方“科学万能”的迷梦,已告破产。归国后他几次演讲都反复强调,此次旅欧的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因此在思想上变被动为主动。不过,无论是杜亚泉还是梁启超,其上述见解都只限于随感而发,缺乏系统的论证;1920年底,梁漱溟推出自己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从哲学的思辨上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化发展著名的“三种路向”说,断言现今世界文化正折入第二路向,趋于“中国化”。由是他揭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的重要命题。这是近代国人系统论述中西文化的第一部著作,它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实则无论梁漱溟的具有世界文化模式论意义的理论见解是否确当,毫无疑问,它已为国人进一步认识中西文化提供了新的基点,其影响所及,我们今天都能感受到它。

上述因欧战在东西方所引起的反响,其时持论激进或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多不屑一顾,以为反动复古,嗤之以鼻。例如,有人就认为,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因之“‘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①胡适也指出,欧战后西洋人对自己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②。这种说法不仅抹杀了许多主张复兴中国文化的本国人士的意见,甚至也将包括罗素、杜威等在内肯定过中国文化优长的许多西方学者的意见一并抹杀了。上述的判断不能说没有自己的一点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以偏概全,从而忽略了欧战后世

① 《中国社会思想的大变动》,《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②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卷一,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世界文化的对话。

欧战所以成为世界历史的转变点,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环球同此凉热”。而战后诸如国际联盟一类世界性组织的出现,也说明人类已自觉到有协商解决共同性的世界事务的必要(尽管“国联”在其时实际不过是列强的联盟)。这在观念形态上,便是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变动。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①所谓世界文化的对话,说到底,就是战后人类在肯定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谋求综合东西方文明的智慧以解决全球性共同问题的过程,它所反映的正是文化观念的变迁。只是因具体的场景不同,战后东西方民族在走向世界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其文化观念的变迁表现出了相异的态势而已。

在西方,它表现为许多有识之士摆脱“西方中心”论,开始以平等的心态研究和借鉴东方文化。数世纪以来,欧化东渐的过程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迫使东方屈服于西方的过程。由是,在西方民族中便形成了以自己的价值观衡量一切,无视东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所谓“西方中心”论。战后欧人对西方文明躬身自责和称誉东方文明,不应当简单地都归之于“一时病态的心理”,其中许多有识之士确是基于对大战的反省,进而对东西文化重新进行了“总体的性质评估”,获致了新的认识。《西方文明史》的主编马文·佩里指出:毫无疑问,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都已经表明了它弊端丛生,正走向衰败。所以,“大战之后,欧洲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明有了另外的一种看

① 《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4 页。

法”，即不再自信西方文化是首善的了。^① 在此种新的认识中，最为深刻也最具勇气的见解是斯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这就是：明确反对“西方中心”论，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他写道：“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作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从分量看来，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景中的地位 and 古典文化是一样的，从精神上的伟大和上升的力量看来，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②

斯宾格勒的观点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葛达德、吉朋斯在合作评介前者的著作时，就特别指出：“明乎人类文化之途乃由多数个别之文化，而非由一文化之继续生长，明乎文化之定律及各文化肇始之年代，并其发展之分期，则本书之内容思过半矣。”^③ 欧洲著名学者爱德华·迈尔虽不赞成斯宾格勒的许多观点，但于他的文化多元论却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尤其信从有机地活着的诸文化的平行论的基本观点，并以他的重大威望掩护了这一观点。”^④ 在东方，斯宾格勒的观点自然更受到了欢迎。有人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著文说，斯氏的最大长处，“在能超出欧美寻常人士之思想感情范围之外”，“而不以某一族某一国为天之骄子，可常役使他国他族，而常保其安富尊荣”。他的这一崭新的研究方法，“实已予吾人以极深刻之刺激及有益之榜样”。^⑤ 斯宾格勒把自己的文化多元论比作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不无道理，从这个意

① 《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368、454—455 页。

② 《西方的没落·导言》，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34 页。

③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学衡》第 63 期。

④ 查理·弗兰西斯·爱金孙：《西方的没落·英译本序言》。

⑤ 《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详》，1928 年 2 月 13 日《大公报·副刊》。

义上说,《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是战后开始世界文化对话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表征。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于战后罗素、杜威、杜里舒等人先后访华,并发表批评西方文化和赞扬中国文化的言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就不应当怀疑其诚意。蔡元培曾谈到欧战后中国学者到欧美去,“总有人向他表示愿意知道中国文化的诚意。因为西洋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渐渐儿有点不足感想,所以想研究东方文化,做个参考品。”^①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开始了综合研究世界文化的实践,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政治、历史、哲学四系的12位学者合作出版了《当代文化概论》;威尔士等56位学者推出了《历史大纲》;房龙与麦克勃则分别出版了《人类的故事》和《文明之进化》,各书均为“综合的世界文化史”。《最近文化史之趋向》一文的作者评论说,这些新著的一个共同点即在于强调:“今后世界公共之和平与人类公共之幸福,非对人类文化发生综合之意义与总合之态度,从智识之创造以改造人心而增进人格,则世界之前途无望是也。”^② 此外,剑桥大学等西方一些著名大学的入学考试,开始增加包括中国的古代典籍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内容,固然反映了西人对东方古典文明的重视;而战后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印度的泰戈尔,显然更具有象征的意义。泰戈尔在获奖后说:“(这)也可以说是西方人民承认东方人是世界公共文化的共同工作者。这种共同工作在目前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共同工作便是表示东西洋两大半球的人们的相互提携。”^③ 善良的东方民族感受到西方民族的文化观念正发生可喜的变化,是多么的欣慰!

如果说,上述西方战后文化观念的变动,是体现了克服自大心

①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最近之五十年》,《申报》五十年纪念专刊,1922年。

② 高宝寿:《最近文化史之趋向》,《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

③ 《东与西》,《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

理以平等待人的取向;那末,东方的变动取向则是体现了克服自卑心理以自立立人。列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东方民族。战后东方民族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同时还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突显。毛子水的《师友记》记载说,梁启超赴欧考察,后即在巴黎近郊的美景村开始准备写文章,“其目的在为中国谋出路,尤其是为中国文化谋出路”^①。而泰戈尔则告诫说:东方民族要自立和助益世界,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要“获得精神自由,与西方人同站在文化的水平线上——假如这一着失败,东方人珍贵的遗产,怕就要消灭,因为单模仿西方是无益而且可笑的。”^②很显然,从泰戈尔到梁启超,东方的有识之士正是从欧战的烈焰中感悟到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东方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认定东方民族的出路在复兴固有文化以裨益世界,而不应是盲从西方。不管他们的文化运思实际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其基本的理路并不错。泰戈尔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真理和鸟一样,有时在天空翱翔,有时也须躲在巢里。巢的需要是无穷的,其建筑的法则是永久的。数世纪以来,东方人不曾留心给真理建一个巢,她单凭两翼一味追求“无限”的境界,结果掉到了地上,受了伤,疼痛着求别人的救助了。“但是,如果因此便说天空的翱翔者与巢的建造者,这两个是永不会联合的,这话是对的吗?”^③比喻切当与否,姑且不论,但泰戈尔渴望东西文化平等对话的殷殷之情却是跃然纸上。梁启超主张借助西方文化来扩充中国固有文化,再以中国文化去助益西方文化,并使二者化合成全新的文化以造福人类,应当说,其文化取向与泰戈尔是相同的。梁漱溟相信中国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世界文化的“中国化”,有失偏颇,这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受到了时人的批评,但人们又多忽略了

①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38 页。

② 化鲁:《台戈尔的东西文化联合运动》,《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2 号。

③ 《东与西》,《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18 号。

这样一点:他不仅主张“承受”西方文化,而且其世界文化“三种路向”说,又是以否定“西方中心”论,肯定文化多元发展为前提的。欧战后在中西方分别出现了一部都主张多元论的有影响和引起了激烈争论的文化专著,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却具有象征的意义:“西方中心”论已告动摇,世界文化对话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世界文化走向对话,其外烁特征是否定“西方中心”论,承认世界文化多元性和东西互补。此一文化观念的变动在战前已露端倪,但它在东西方具有确定的形态和表现出明确的趋向却无疑是在战后。“西方的没落”、“欧洲文明的危机”、“世界化”、“东方文明的复活”、“复兴中国文化”、“中国化”等等新的语言符号在战后纷纷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它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衰堕和东方民族文化主体觉醒的产物。固然,真正实现世界文化对话,不是轻而易举和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各国人民逐渐学会消除敌意、隔阂,实现和谐相处的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对西方民族来说,真正彻底地消除民族优越感和霸权观念,诚恳平等地与东方民族和谐相处,谈何容易!同样,对东方民族来说,复兴固有文化以助益世界的目标是揭出来了,如何处理古今东西的关系,避免颂古非今和隆东抑西而陷于自我封闭,所面临的误区正多。但是,尽管如此,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毕竟已经到来,它不能不影响到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二、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

欧战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转折点,包含着两大特征:一是世界文化走向对话;一是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二者自有其内在的联系。缘于国人对此感悟不同,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面临着新的变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与欧战同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既奉西方文化为圭臬,为了保持自己所崇敬的西方文明的圣洁形象,最初总是把这场残酷的战争说成是代表西方文明正宗的法兰西文明与德国军国主义即正义与邪恶间的较量。这说明他们不仅未能看清欧战的实质,且未感受到世界潮流的变动。但是,战后强权主义有增无减的现实,尤其是受俄国革命的感召,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开始转向以俄为师,接受马克思主义。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即已感悟到“桐叶落而天下惊秋”;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俄国革命则若春天的惊雷,预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经历“绝大之变动”。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欧战是“资本家的政府”间的不义战争,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他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向国人作了全面的介绍。李大钊开始由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象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出来。当时有人这样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① 尽管其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尚属幼稚,但李大钊等人的实践毕竟表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已超越了自身,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了。

与李大钊等人相反,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对欧战后世界潮流的变动,却是无动于衷。丁文江以为西方政治家、教育家缺乏科学知识的修养才是欧战发生的真正原因;吴稚晖干脆

①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

说欧战的发生,是贫穷的东方民族引起的,“是余中国人之罪”。这类说法很能代表这部分人的见解与心绪。胡适信仰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主张“好人政府”和由一点一滴做起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俄国式的“过激革命”。他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目的是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次胡适经俄国赴欧,李大钊曾让人劝他不要西去,径直回国,但胡适不能听,坚持“往西去!”经由美国而归。此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李大钊等人转而“以俄为师”,胡适等人却坚持“往西去”,以美国为师,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裂便成了不可避免。1919年夏,在李大钊、胡适之间发生了“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论争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派,终归分道扬镳。

战后,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固然引人注目,但东方文化派的异军突起,也同样令时人刮目相看。所谓“东方文化派”,并无明确的界定,它是其时持论激进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以泛指欧战后力主反思西化并以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一派人,意存调侃与贬斥。例如,邓中夏说:“这一般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东方文化派’”。^① 其主要的代表人有:梁启超、张君勱(玄学派);梁漱溟(后来的农村建设派代表);章士钊(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又称“甲寅派”代表);吴宓、胡先、梅光迪(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又为“学衡派”代表)等。东方文化派内部派别林立,个人情况也多不同,但他们对于战后世界潮流变动的感悟,理路相类:欧战是西方文化过于趋重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破绽百出,相形之下,东方文化趋重精神文明是其优长,自有它独立的价值。东方文化派同样主张社会改良,抵拒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东方文化派个人开出的救治中国的处方不尽相同,如“走孔子的路”、“以农立国”、“农村救国论”等等,但强调从

①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东方文化吸取诗情却是共同的。

东方文化派可以追溯到欧战结束前曾与《新青年》论战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但其势力确然兴起,却是以192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为标志。胡适强调梁启超是书的发表,如同放了一把“野火”,使西方文明的权威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而同年底梁漱溟出版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且在短短的3年里再版十余次,产生了长久的影响,都说说明东方文化派在其时具有怎样的影响力。东方文化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自身的必然性:欧战既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对话,久受压抑和冷落的东方文化在东西方引人关注,甚至一时形成全球的“东方文化热”,是应有之义和合乎逻辑的事情。《申报》记者评论说,东方学者泰戈尔访问欧洲和西方学者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相继访问中国,都分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战后东西文化对流作用之一种表现”。^①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国人反省欧战,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应乎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的产物。此其一。新文化运动以西学反对中学,以新学反对旧学,于其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对复杂的文化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一味颂扬西方文化和否定固有文化,也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弊端。欧战后西方文化既破绽百出和出现了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其弊端自然凸显了。陈嘉异说,主新文化者“一谈及东方文化,几无不举首蹙额直视为粪蛆螂蛄之不若”。“以国人而自毁其本族之文化若是,此虽受外来学说之影响,而亦国人对于己族文化之真正价值初无深邃之研究与明确之观念使然”。^②东方文化派的出现又是反省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此其二。战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要求民族自决的呼声日高。东

① 《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

② 《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280页。

方文化派高扬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梁漱溟在谈到自己所以决心要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的动因时说:现在对于中西文化问题“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① 张君勱也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② 东方文化派强调复兴民族文化进而复兴中国,这说明,归根结底,它的出现又是中国民族进一步觉醒的产物。此其三。

由上可知,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发生了新的变动,即由原先新文化运动一枝独秀,衍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东方文化派三派各领风骚的格局和呈现出多元演进的态势。三派的文化取向,各异其趋:

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取向是:调和中西,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调和中西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东方文化派的共识。在这方面梁启超与陈嘉异的表述最具体。梁主张(一)“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二)借助西方的研究方法,“得他的真相”;(三)“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使二者起化合作用,成一新文化系统;(四)把这个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使世界受益。^③ 陈则主张:(一)“以科学方法”研究东方文化;(二)以“东方文化真义”建一有价值的生活;(三)输中国文化精蕴于欧洲;(四)融合西方文化的“精英”;“创造一最高义的世界文化”。^④ 二者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固有文化,在得其精华的基础上,再融汇西方文化,创造民族新文化,助益世界。应当说,作为一种原则,这是对的。它强调了以民

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399页。

② 《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443—444页。

③ 《欧游心影录》,《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373—374页。

④ 《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279页。

族文化为主体建设新文化的可贵思想,使自己与醉心欧化划清了界线,同时又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守旧派。但其文化主张也存有着明显的误区,一是执着于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复认定欧战已宣告了物质文明的破产,便难以尽脱隆中抑西的情结;他们把中国文化的“真相”、“真义”即精华,体认为“孔子的态度”、“孔颜的人生”或叫孔孟的“精神生活”,即简单归结为儒学传统,强调了文化的承继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因是之故,他们的调和中西创造新文化的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理性基础,自然少了时代的亮度,而难于尽脱恋古的情结。

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西化。

1922年11月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梦麟谈欧洲情形,极抱悲观。这一次大战,真是欧洲文明的自杀……但世界的文化已在亚美两洲寻得了新逃难地。正如中国北方陷入野蛮人物手里时,尚有南方为逃难地。将来欧洲再堕落时,文化还有美亚澳三洲可以躲避,我们也不必十分悲观。”^①在这里,胡适虽然也对欧战表示震惊,但他很快即自为宽解,相信西方文化已是“世界的文化”,欧洲虽发生“文明的自杀”,那毕竟是局部的问题,已成为世界文化的西方文化是无须“悲观”的。很显然,其思想进路的前提是:西化就是世界化。在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久已风靡之后,胡适于西方文化无所反省,其固执与肤浅令人震惊。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在公开场合绝少提及欧战及其严重的后果,相反却极力为之掩饰。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讥笑一些人是传统文化的“夸大狂”,但自己却又成了西洋文明的“夸大狂”。欧战和社会主义的高涨已充分暴露了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绽,胡适却不顾现实,固执地硬要把西方描绘成是“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是正在建设中的“人的乐园”、“人世的天

① 《胡适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1页。

堂；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①他依旧不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偏向，指斥中国民族乃是不长进的民族，百事不如人。他写道：“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②总之，在胡适眼里，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认为“东方文明”甚至不成名词的常乃德，曾将胡适等人的文化取向作了如下概括：“在文化和思想问题上，我是根本赞同胡先生的意见的，我们现在只有根本吸收西洋近代文明，决无保存腐败凝滞的固有旧文明之理”。^③胡适诸人依然故我，他们在简单否定固有文化基础上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一条生路”，无疑是一条不脱民族虚无主义的醉心西化之路。所以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实为“西化派”。

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在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相信文化的变动终归是服从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他们认为，中国固有文化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了。同时因列强的侵略，中国旧文化复陷入了殖民地文化的命运，反转来又成了列强借以愚弄中国人的侵略“武器”。所以主张复活旧有文化，无异于为反动势力张目；但我们也决不当去“歌颂西方文化”^④，因为胡适所津津乐道的西洋近代文明，已经是“腐朽不堪行将死亡的文明”。现在西方真正新兴的健康的文化，是“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我们所当欢迎的西方文化是指后者，而不是前者。^⑤瞿秋白、泽民

① 《胡适文存》(三)卷一。

②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

③ 《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676页。

④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62页。

⑤ 希祖：《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665—666页。

堂；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①他依旧不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偏向，指斥中国民族乃是不长进的民族，百事不如人。他写道：“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②总之，在胡适眼里，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认为“东方文明”甚至不成名词的常乃德，曾将胡适等人的文化取向作了如下概括：“在文化和思想问题上，我是根本赞同胡先生的意见的，我们现在只有根本吸收西洋近代文明，决无保存腐败凝滞的固有旧文明之理”。^③胡适诸人依然故我，他们在简单否定固有文化基础上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一条生路”，无疑是一条不脱民族虚无主义的醉心西化之路。所以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实为“西化派”。

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在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相信文化的变动终归是服从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他们认为，中国固有文化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了。同时因列强的侵略，中国旧文化复陷入了殖民地文化的命运，反转来又成了列强借以愚弄中国人的侵略“武器”。所以主张复活旧有文化，无异于为反动势力张目；但我们也决不应当去“歌颂西方文化”^④，因为胡适所津津乐道的西洋近代文明，已经是“腐朽不堪行将死亡的文明”。现在西方真正新兴的健康的文化，是“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我们所当欢迎的西方文化是指后者，而不是前者。^⑤瞿秋白、泽民

① 《胡适文存》(三)卷一。

②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

③ 《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676页。

④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62页。

⑤ 希祖：《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665—666页。